

天主堂的文化價值

韓大輝

近幾年，我有機會探訪國內的教會，發現宗教政策逐步落實，很多地方都能重新修堂或建堂（天主堂）。當然，作為信徒，大家都希望有一間像樣的聖堂，可是，甚麼算是像樣的聖堂呢？要有哥德式的尖頂、羅馬式的鐘樓、希臘式的聖像嗎？任何一項選擇必會牽涉到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：為甚麼要有天主堂？五零年代，有人認為天主堂是人民的鴉片堂，倒不如改裝為民居、工廠、會堂等用途。可是今天在國家宗教的政策中，卻又肯定天主堂的宗教價值，又將這些地方恢復原貌，至少可讓人民在此實踐宗教敬禮，以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。

如何界定「人民的精神需要」？回答這問題不能不談文化背景，因為文化可為這需要定位。換言之，我們可以這樣問：如果天主堂有其存在意義，那麼它可產生甚麼文化價值？本文想作一個初步的反省。

文化是由於人按其心智活動對生活環境有所反應，因

而漸漸形成一種生活模式，包括語言、心態、民生、律法、藝術、交往方式、風土人情等這種模式能有效地標榜出某一類型的社會群體。普遍來說，一個社會由於有不同階層的人（富人，窮人；士官，庶民；知識分子，文盲等），也會有共通的主流文化，和分殊的次文化。

文化的價值在於「化」，即通過某種氛圍的「教化」、「濡化」，使人得到個人靈肉統一的健全發展，並使這個體的「人化」進入有機的、多元的社會整體中，同時使「人化」的個體在思想、感情、行為模式各方面與社會的氛圍相適應、相和諧，因而實現真、善、美高度統一的、解放性的自由境界。

在各地的文化轉型中，不少學者會認同，近個半世紀，有一種世界趨同的現象。我們不難發現其中兩個特質，一是「發展個人」的取向，二是「普世性」的取向。今後中國文化的發展亦不離這兩個特質。任何地方要「發展個人」，亦要參照世界各地發展個人的特質，但這並不意味著泯滅中國的特色，而是說中國的文化發展必須吸收世界文化一切優秀的成分，同時必須向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。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」，亦即肯定在吸取世界積極的經驗之餘，也要弘揚中國的文化。社會主義是世界的經驗，且不是在每個地方都成功的，如果要在中國成功，自然就要配合國情。

經驗告訴我們，宗教與文化的發展也同樣息息相關。這可從天主教聖堂早期的發展史看出來。我們可分三個階

段論述：

第一，基督徒保存猶太人的文化傳統，並在猶太的框框中注滿基督福音的內容。這樣他們可保持與猶太宗教的聯繫。猶太人最初是以「會幕」，亦即安放結約之櫃的「帳棚」，作為人民集結和敬禮神的地方，後來撒羅滿建造耶路撒冷的「聖殿」主要為舉行各種祭禮。當猶太人被充軍到巴比倫後，便漸漸建築了「會堂」，作為祈禱和聽聖經的聖所。耶穌來了，基督徒不再重視耶京聖殿本身，而只看其象徵意義，因為「真正朝拜的人，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。」（若4:23）在新約中基督徒著重天主與人的位際關係，故此，人的身體被喻為帳棚（格後5:1），人就是聖殿（格前3:16）。不過早期的基督徒仍然「每天成群結隊前往聖殿，也挨戶擘餅。」（宗2:46）保祿傳教時，也首先往「會堂」宣教。時至今日，天主堂內的設置仍保留猶太文化的痕跡，如：聖體櫃、祭台、至聖所等。

第二，基督徒將福音的內容伸延到非猶太人的文化框框中。伯多祿和保祿在羅馬的殉道意味著基督的信仰已進入世界的文化，因為羅馬當時被視為世界的中心。這新興的宗教躋身於當時各大文化宗派中，顯得微不足道。再者，基督徒所宣講的竟是一個被判十字架苦刑的賤民，即使說他復活了，亦無從引起人的注意。但奇怪的是，仍然有人相信這宗教，他們繼續「挨戶擘餅」，這表示基督徒以家居為舉行感恩祭的地方。有些基督徒家境富裕，可以提供很大的地方作聚會，在第三世紀（250年）已有文獻（*Didacalia apostolorum*）描寫這些地方的劃分：聚會的禮

堂有主教的座位，旁邊有執事的位置，再圍繞著司鐸的坐席（長老團，即主教的參議），然後有平信徒的地方，男女分開，禮堂隔壁有一個房間為慕道者用，另一間房則為洗禮用，兼有浸洗池。這些安排都與希臘、羅馬文化有關。

第三，基督徒盡量保持信仰的特質並以此創造新的文化，為滿足民衆的各項需要。頭三個世紀，基督徒聚會的地方主要是為信徒。當時這宗教並未受到一般人的接受，而且所經歷的教難不下十數次。由於他們聚會地方並非是公開的，往往造成人們的猜疑，謠傳他們聚會時吃嬰兒的肉和飲血等。幸好基督徒的殉道者改變人們的這些看法。此外，由於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，基督宗教的發展更為順利。他在公元三一二年，從夢中得到指示以基督的十字架作旗號，且在 Milvian Bridge 之役戰勝其政敵 Maxentius。翌年，他頒下米蘭諭令，給予教會宗教自由，可公開傳教、集會。羅馬大帝還建造了 Basilica（中文譯作聖殿，原意是指屬於皇帝的宮廷）讓基督徒在這些地方聚會時，有更大的保護和特權。當然在這期間，基督徒人數多了，愈有需要大型聚會的地方，但這些地方已從私有的家居，轉變為向公眾開放的會堂。隨著日後歷史的發展，不同文化色彩的聖堂應運而生。

綜觀上述，我們可見到不是人為聖堂，而是聖堂為人。讓我們扼要地說明，天主堂在今日可以產生的文化價值。

1. 宗教自由的象徵

自君士坦丁大帝時代，聖堂漸漸具有象徵宗教自由的意義。基本上，誰否認宗教自由，就不能整體地尊重人的自由。這意味著天主堂必須在具體的文化中，迎合人生的需要。事實上，這個意義影響所有聖堂的建築。今日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已是建設普世新文化不可或缺的條件。對某些人來說，為建設更人性化的社會，固然有賴堅強的宗教信仰（肯定客觀的、超越的神和對祂的委身）；不過，從社會的整體而論，宗教人士可從其超然的宗教觀，在一個多元的文化裏，提倡人性化的價值，如：和平、博愛、公義、平等、環保……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。

2. 信仰團體之家

基本上，天主堂是天主子民的家。他們聚集在同一個屋簷下，形成一個信仰的團體，共同宣告基督的福音，慶祝祂的奧跡，勉力實踐愛德，服務大眾和度聖善的生活。這些都是他們在同一屋簷下共有的終極價值。聖堂的建築須傳達這些價值，使人置身其中會感到天主親切的臨在，和祂的大能。當信徒以天主為生活的核心時，就能將祂超越、神聖的一面彰顯在平實的生活中，而無須硬生生地將「神聖」和「俗世」分割，（免致有人誤會宗教只顧將來、忽視現世、麻醉人生的鴉片）。天主的救恩是為眾人的，基督來將救恩實現了，教會作為救恩的延續者，須使聖堂成為天主接待眾人的神聖地方。它是一個尋常的、大眾化的

地方，因為人人都可以來，同時又是不尋常的、高尙的，因為它是天主與人相遇的地方。

3. 教育工作

任何產生文化價值的機構都會著重「化」、亦即潛移默化的教育工作。中國人口衆多，在今日邁向現代化的高速發展中，尚有很多教育工作的空間。事實上，回顧基督宗教在歐洲的歷史，天主堂往往在教育界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中世紀的查里曼大帝，透過主教座堂、本堂甚至修道院推行領導社會人才的培訓，有些在後期轉變為有名的學府。天主堂可按環境及能力，提供一些教育性的服務給當地的社區，諸如：提供地方給學生們自修、開補習班、成人培訓班等。港、澳、台（甚至大陸以前的）天主堂很多都和教育工作相互依存的。

4. 彰顯人性的訊息

天主堂雖然以基督福音作信念，但由於它是處於一個特殊的文化環境中，故此忠於福音，忠於當地的人，是天主堂長期立足的條件。福音和當地文化最基本的共同點，是兩者皆以人為本，以建設更人性化的社會為大方向。這使我們想起，教會自起初已深信天主在各地的文化中已留下祂的踪影（參閱羅1:20），尤其那些彰顯人性、發揮人性的文化要素上，福音必然可以、而且應該根植其上。這樣福音與文化必能相得益彰。今日中國處於經濟飛升的時代，

很容易隨著物慾主義、個人主義而產生「精神污染」，對人性社會的成長構成威脅。幸好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價值，在某種程度上仍存留著，如：仁義、忠信等，傳福音不但要肯定這些價值，也藉天主的愛、慈悲、彼此擔待、寬恕……一起來淨化精神的污染。

5. 社會福利

教會自起初就是要建立互助互愛的團體，「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，凡各人所有的，沒有人說是自己的，都歸公用。……他們中，沒有一個貧乏的人。」（宗4:32-34）。天主堂在歷史中曾經是很多人的避難所。人們也願意捐獻給聖堂作為濟貧之用。隨著時代，社會的民生不斷改善，天主堂所做的福利工作也漸趨多元化，如：診所、文娛活動中心、青年宿舍、托兒所、輔導中心等。遇有迫切的情況，天主堂往往成為救急的中心。

6. 宗教藝術

西方傳統的禮儀藝術是為幫助人憶起整個救恩的計劃，亦即天主對人的仁慈和忠信。天主堂由建築外形到內裏的聖洗池、祭台、讀經台、聖體櫃、聖像及各種擺設都要顧及整體的和諧。聖堂的裝飾要迎合人內心的呼聲：希冀得到神的仁慈、安慰和愛情的欣悅。任何物品放在聖堂裏都先要問與敬禮何干？該注重藝術品的材料和手工，務使它們能承載禮儀行動所表達的奧秘、莊重、驚歎。聖堂的藝術裝飾添上（中國）地方文化的色彩，並非是一種可有可無

的選擇，而是禮儀適應文化「必須」的一環，可助人在其熟悉的標記、象徵中深化人生的終極意義。

本文只有一個簡單的結論：我們在修堂或建堂時，務須注意天主堂對當地所產生的文化價值，忽略這一點，也會漠視天主救恩的普世性和發展個人的特性。



韓大輝神父：慈幼會士，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神學教授。